■ 不忘初心

父子共同抗战，在郓城传为美谈，群众还编了一首歌谣：“老区长，梁秀松，骑毛驴，戴眼镜，倾家荡产闹革命，年高六十又出征，儿子当县长，老子听命令，抗战杀敌人，梁家父子兵。”

梁仞千:从学生党员到中共七大代表

□ 本报记者 于岸青

在水浒故里郓城革命烈士陵园里，安葬着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烈士1307名，郓城的儿子——梁仞千烈士就安葬在这里。

梁仞千是郓城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曾任中共郓城中心县委书记、中共运西地委书记、郓城专员公署秘书长，1940年当选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冒着枪林弹雨，经过8个月的跋涉到达延安，由于七大延期召开，他被分配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一年后因病不幸去世。中央和山东代表团为梁仞千召开了追悼会，把他安葬在中央研究院附近的兰家坪山坡上。后由毛主席签字，向梁仞千家属颁发了烈士证。1972年，梁仞千逝世30年后，郓城县革委会将梁仞千的遗骨迁回了家乡。

如今，菏泽市郓城县每年都在烈士陵园举行革命烈士公祭活动，深切缅怀梁仞千等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

抗日组织“窝窝队”

1938年5月的一天，快到中午了，在郓城南的飞哲集，“抗日自卫团训练班”第三期50名学员还在上课，这一课“抗日救亡的形势和任务”由梁仞千主讲。天气已经转暖，他还披着一件黑色的棉大衣，脸色有些苍白。趁着梁仞千喝口水的空儿，工作人员进到教室告诉他，外边来了四辆马车，拉着30多个青壮男子。

这支队伍是从延安来的。他们经菏泽我地下党员介绍来此打尖。梁仞千看到介绍信后非常激动，毛主席派人来了，赶紧把他们让进门来。

抗战全面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指示，以及北方局“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从1937年7月到1938年6月，中共山东省委组织发动了徂徕山、天福山、黑铁山、泰西区等十几起遍及全省的抗日武装起义，齐鲁大地燃起抗日熊熊烽火。但起义之后，聚集的两三万人队伍向何处?

1938年4月，山东省委书记黎玉赶赴延安向中央请示，毛泽东和中央决定派郭洪涛同志率段君毅等几十名红军干部去山东。行前，毛泽东接见全体同志时说，到山东敌占区去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是党中央交给你们的任务。

郭洪涛他们身着八路军服装，执八路军“护照”，一行从西安乘火车到河南柳河车站下车，然后步行进入山东曹县。这里当时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驻地，省主席沈鸿烈派人来表示不能对八路军的安全负责。经我地下党员、国民党菏泽县县长的秘书宋心田帮助，雇了四辆马车，他们从菏泽来到了郓城。

梁仞千请同志们与学员一起共进午餐，郭洪涛他们看到端上来的大黑窝窝头足有碗口大小，十分新奇。梁仞千笑说：“我们这个自卫团，没有经费，光吃大窝窝、咸菜，喝稀饭，群众称我们为‘窝窝队’。”郭洪涛称赞说：“这窝窝可比两万五千里长征时吃草根皮带好得多喽。”

饭后，梁仞千仔细汇报了中共郓城中心县委的工作。县委以“抗日自卫团训练班”的名义培训了大约一百多名学员，前两期毕业学员已经在郓鄄巨菏四县边区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以洪王庄支部为起点，已经在各村陆续建立了十几个支部，甚至在国民党四区(今郓城县郭屯镇一带)中队也建立起共产党小组，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共郓城中心县委。郭洪涛听完汇报，紧紧握着梁仞千的手说:“仞千同志，郓城的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这很不易呀。”梁仞千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带头这样做。”

郭洪涛一行没有久留，饭后即赶往泰西，开始了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征程。梁仞千近乎从零开始的艰苦工作，给郭洪涛、段君毅留下了深刻印象。

要当任守钧那样的共产党人

1933年，21岁的梁仞千从菏泽六中考入济南高中。

在菏泽六中读书时，梁仞千常去曙光书店看书，深受书店经理任守钧的影响，经他介绍还到曹州民众教育馆听讲座。梁仞千并不知道主讲人孔庆嘉和任守钧都是共产党员，但他们的宣讲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梁仞千脑海中。1931年春天，二人不幸被捕。他们受尽酷刑宁死不屈，无计可施的国民党曹县县党部将任守钧、孔庆嘉押往济南第一监狱。1931年4月5日凌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下令将在押的共产党员枪决。任守钧、孔庆嘉与包括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在内的21人，于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济南高中是济南市民对山东省立高级中学的习称，七七事变前，济南高中是全省唯一一所三年制高中，在全省中学中名气最大，以师资最好、设备完备、校院宏大著称。在济南高中，梁仞千存心要寻找跟任守钧、孔庆嘉一样的人。两年的时间他留心观察寻找，当他知道高一级的同学林浩就是共产党员后高兴极了，遂向林浩提出了入党申请。

山东党组织在1933年连续经历了三次大破坏，跟中央失去联系，济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济南高中支部与济南乡师、新城兵工厂支部是几个硕果仅存的党支部。林浩作为济南高中支部书记在黑暗之中谨慎地发展党员，为日后重建山东省委作准备。1935年，经林浩介绍，梁仞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适逢林浩毕业，梁仞千接任济南高中支部书记。

到1936年梁仞千本该毕业了，由于前一年患上了肺结核，就一直住在学校的病号房里，毕业延期。病号房成了济南高中党支部的“办公机关”，校内外的革命同志和进步学生，借探望病号的名义与梁仞千进行联络。他巧妙地利用这个条件，讲解革命道理，在学生中间发展了20多名党员，并参与领导济南的学生运动。

1935年底一二九运动席卷全国，刚刚恢复的中共山东省工委投入到这场运动之中。在赵健民、林浩、梁仞千等领导下，12月16日济南高中率先罢课，济南师范、正谊中学、齐鲁大学等校相继罢课。在这场运动中，根据党组织关于迅速扩大学生救亡组织的指示，1936年春“济南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改组为“山东省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梁仞千为领导人之一。根据市委的指示，他相继领导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声援“绥远抗战”并捐款等学生运动。

1937年，大批的平津、东北流亡学生涌入济南，各自成立了同学会、协会。为便于统一领导，在梁仞千等同志协调组织下，他们共同发起成立党领导下的革命团体“文艺友联社”，并编辑出版内部刊物《联系》。6月的一天，文艺友联社成员金默生和孙鸿文正在位于七大马路纬一路的印刷局校阅校样，突然来了几个便衣警察将他俩逮捕。到了山东省警察厅拘留所，他们发现另有9名编辑部的同学已经被捕。

得到消息，梁仞千立即设法营救，他想办法通过菏泽六中丛禾生校长找何思源进行疏通。关押一个多月后，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狱中，同学们群情悲愤，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宁为抗日死，不做亡国奴！”然后高唱救亡歌曲，整个监狱都为之震动。

又过了几天，11个同学随大批“盗匪犯”、贩毒犯，戴着手铐，被押解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一个大厅前面的小广场，旁边是两列手拎大刀的武装士兵，原来，国民党省主席韩复榘要亲自“断案”。在大厅的前廊，韩复榘身穿黑绸便服坐在椅子上，戴着墨镜，不时地啜一口茶。一名警官拿着稿子，逐个宣读“罪行”。11个同学的“罪名”是：“这11个学生编印非法刊物，谩骂政府，进行赤色宣传，妨碍邦交，扰乱治安，请主席发落。”听罢，韩复榘慢条斯理地说：“你们学生不好好念书，抗的什么日？你们抗日在这里不是地方，把你们送到北平29军去，到那里抗日去吧！”同学们当即高声抗议：“我们坚决抗日，全国包括济南在内都是抗日地方！”韩复榘并不理会，突然大喝一声：“看你们这伙学生留着洋头，还抗的什么日！统统给我剃光头，驱逐出境！”11名同学都被剃了光头，并被送上了北去的火车——被“驱逐”出了山东之境。

这时，梁仞千也被当局盯上，警察到校抓人，学校有人指路：“赶快包围病号房，那个姓梁的老病号就是共产党!”几个警察立即包围了病号房，进屋一看，空无一人。原来，更多的校友在暗中保护着他们，梁仞千和其他几位学生党员，在同学的保护下，迅速越墙离开了学校。

原山东省立高级中学，习称济南高中

父亲当“粮库主任”，掏空自家粮囤

梁仞千身份暴露，在济南待不下去了。鉴于他的身体情况，梁仞千带着山东省委交给的任务回到了家乡——郓城县武安乡洪王庄。

革命不会不胫而走，需要革命者筚路蓝缕才能发展壮大起来。说是回乡养病，但梁仞千一天也没有休息，便探亲、访友、看望同学，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联络了50多人，并介绍一批进步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9月，郓城县第一个党支部——洪王庄党支部建立，隶属中共山东省委领导，梁仞千任书记。4个月后，在鲁西南特委的领导下，郓城、鄄城、菏泽、巨野四县边区县委（后改为郓城中心县委）成立，梁仞千任县委书记。

1938年春，济南已经沦陷，全国抗日的呼声更为普遍。为组建抗日武装，培训骨干力量，郓城中心县委以鲁西抗日自卫团的名义，先后在郓城飞哲集等地举办训练班。举办训练班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合理合法方式，与现在不同，召集学员来听讲，不但不要学费，还要提供食宿，每期训练班50人左右，加上工作人员，每天要为60人准备食宿，这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

梁家在当地是比较富裕的，梁仞千动员父亲梁秀松：“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老人家就来当粮库主任吧。”梁秀松老先生听儿子说，一个月下来需要几千公斤粮食，十分心疼，这是40亩地一年的收成啊。梁仞千说：“为了抗日救国，儿子我要领着大伙干，就得带头。”梁老先生听到精忠报国，便慨然允诺，把自家粮囤掏空送来了2500公斤高粱，带动了其他乡绅捐钱捐粮，终于凑够了所需的4000公斤粮食。虽然全是粗粮，但保证了训练班按时开课。

高粱面性散，没有黏性，一个个窝头蒸出来像碗口那么大。训练班请来的老师孙厚甫是云南人，从没见过这种食物，竟以为黢黑的大窝头是盛菜的盆子，梁仞千一边笑一边说，这是爱国面包，好吃。孙厚甫口才极佳，讲课生动感人；梁仞千思维缜密，亲自上讲台宣讲抗日救亡的形势和任务，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意义……训练班在郓城县及其周边影响很大，当地群众也很少吃黑窝头，见他们如此吃苦也要抗日，感到“要都像他们这样，中国就有了希望”，亲切地称他们为“窝窝队”。“窝窝队”的名称，逐渐地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鲁西。

训练班结束后，从中选出30余名骨干，建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郓城县第一支武装力量——抗日自卫团小分队。

梁仞千在延安住的窑洞

父子毁家闹革命，全家上阵齐抗日

多年以后，当时任郓城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的徐雷健回忆：“梁秀松先生是郓城党的主要创始人梁仞千同志的父亲，他是个为革命事业不惜倾家荡产和牺牲个人生命的老人……从郓城县委建立到八路军一一五师入鲁，在这一年多最困难的时期内，县委机关一直住在梁仞千同志的家中。这个家庭不仅为县委的同志提供了全部住宿条件，而且为掩护县委活动承担了全部风险。鲁西抗日自卫团办的三期训练班，有相当一部分粮、款是由这个家庭出卖土地资助的。他这种抗日热情，如果仅仅理解为照顾儿子的情面，是远远不够的……他深信我们的革命事业是正义的，为革命作出贡献是光荣的，这是他支持和参加革命事业的真正力量源泉。”

最早为郓城中心县委建立武装创造条件的，也是梁秀松老先生。抗战前，他是一个普通的乡绅，家有良田百亩，年近花甲，儿孙满堂。在兵荒马乱的时代，他深信儿子参加革命事业是正义光荣的，毅然接受党的委派，利用与国民党郓城六区区长相熟，甘冒风险担任了六区武装的中队长。在任期间，他把徐州会战时从战场中退下来的散兵手中闲置的枪转移到县委，为郓城中心县委创建第一支游击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抗日自卫团成立后，一直没有稳定的给养。梁秀松主动跟儿子提出：“仞千，你是不是为兵马已就、粮草不跟犯愁啊？你爹我可不是那种看财奴，我这个粮库主任是干到底啦，你放心吧！”随后，梁秀松先后卖掉了家里80多亩地维持自卫团的给养。

在梁秀松的带领下，一旦家里来了同志们，梁家就全家齐上阵，梁仞千的母亲妻子妹妹包括舅舅忙着烧水、做饭、筹铺草、喂牲口，还为同志们洗衣缝补。

作为当地有名望的乡绅，郓城的党组织通过梁老先生先后团结争取了国民党四区区长杨巨斗、王相臣，而后又派共产党员李学启任四区队副队长，掌握了四区武装。后来经过继续发展，这些武装包括“窝窝队”都编进了我们的主力部队，走上了抗日战场。

儿子当县长，老子听命令

1938年5月，日军占领郓城县城，一周后日军西侵撤离县城。半年后，日军再次侵占郓城。除了对占领区民众实行“良民证”和保甲连坐等严密控制外，日伪郓城县公署还设立了县大队、自卫团、警察所、监狱和杀人场，主要用于镇压抗日军政人员和民众。对抓住的抗日人员，施以压杠子、坐老虎凳、别筋、灌辣椒水、装进麻袋里摔肉疙瘩等各种酷刑。每隔十天左右，伪县长刘本功就在县城西关外杀掉一批抗日人员。为镇压、控制人民群众的反抗，到处修碉堡建据点，构成控制网，伪军从碉堡里任意向过路行人放冷枪。这些据点的修筑，给占领区民众的人力、物力、财力带来巨大损失。

1939年3月2日，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率领东进支队2600多人到达郓城，驻郓城西北一带。梁仞千率领20多位干部和自卫团战士，到师部驻地状元张楼迎接我主力部队。首长们请梁仞千介绍当地情况，梁介绍说，郓城伪县长刘本功是个铁杆汉奸，他的本家刘玉胜带了一个保安团驻扎在郓城西北的樊坝，横行鲁西平原，作恶多端，鱼肉百姓，鲁西人民苦不堪言。倘若能及早拔掉这颗钉子，必将刹敌人的威风，长人民的志气。

师首长经过商议，决定把打下樊坝作为对山东父老乡亲的见面礼。攻打樊坝的任务交给了杨勇的六八六团，梁仞千派自卫团的骨干作向导，参加战斗。樊坝一战，共毙伤日伪军二百余人，活捉伪团长刘玉胜部下三百余人，缴获机枪二十挺，迫击炮一门，步枪四五百支。民间很快传唱：“三月里来三月三，运西有个梁仞千，他同杨勇肩并肩，抗日反伪有贡献。”

一一五师入郓，极大地支持了地方人民政权建设。1939年9月，郓城第一个人民政权建立，梁仞千当选为抗日政府的第一任县长。《大众日报》报道：“郓城县自敌伪盘踞以来，县政无人负责，为日已久，近该县各抗日团体及全体民众为适应抗战需要，发动抗战力量，前曾召集全县士绅，各区区长各团体代表大会，到会八十余人，讨论各项抗战工作问题，并由全体一致推选梁仞千先生为该县县长，梁氏在全县父老企望之下，已宣誓就职，并宣布施政八大方针。”

梁仞千就职的同时，梁秀松接任郓城六区区长，父子共同抗战，在郓城传为美谈，群众还编了一首歌谣：“老区长，梁秀松，骑毛驴，戴眼镜，倾家荡产闹革命，年高六十又出征，儿子当县长，老子听命令，抗战杀敌人，梁家父子兵。”

中共抗日人员成为“咱们的人”

3个月后，梁秀松秘密召集六区的同志开会，地点选在设在于阁村的我地下联络点春华堂药铺。散会后，其他同志先走了，梁老先生打算最后离开，却不幸遭遇黑手暗杀，壮烈牺牲。事后查明，这是国民党郓城县县长张培修指使当地流氓所为。

梁仞千悲愤至极，叫上一名同志与他一起到于阁村，冒着危险为父亲处理后事。于阁村距洪王庄不过四十多里地，梁秀松的老伴、儿女却迫于形势严峻都没能为亲人送最后一程。实际上，从这一天开始，为躲避暗害，梁家包括梁仞千的母亲、弟妹、妻子、儿女便踏上了东躲西藏之路，有家不能回，年复一年。

父亲牺牲，梁仞千备受打击，他对同志说：“我父亲牺牲后，我的脑子像木头一样，什么感觉都好像没有了。只有工作起来，一切都忘了。”

工作还要继续，这时，接中央通知，中共山东分局选举产生的七大代表陆续赶赴延安，郓城是必经之地。一天夜里，郭洪涛、张经武率领分局代表由部队护送途经郓城太平集时，寨子高高的围墙上有人向他们打枪，阻止通过。张经武命令队伍原地休息，并派人知会村民：“我们是过路的八路军，别误会。”得到的答复是：“决不上当，‘九路军’也不能从这里通过。”护送部队的领导火了，下令机枪打了一梭子。不料，不但没有镇住，还犹如点了爆仗，前后村纷纷开枪示警，方圆十几里的村子都鸣锣、击鼓、撞钟、吹号声援，响成一片，看样子要联防联攻，慢慢地四周黑地里都出现了村民的影子，流弹不断，杀声四起，队伍被包围了。

为避免出现伤亡，张经武派随队的王再天同志再进寨子说明情况，谁知王再天一进去就被绑了起来！原来，王再天刚刚从东北军里撤回，还穿着国民党军队的制服，群众一看大喊：“哪里有你这样的八路军，分明是诈骗！”甚至有人气愤地说：“给他来个大开膛算了。”王再天竭力分辩：“我刚从东北军来到八路军，还没来得及更换服装，我们的队伍是到延安去的……”群众说：“那你说说八路军的领导都有谁？”当王再天同志说出一一五师的杨勇时，群众有点相信了，给他松了绑，但也没释放，说是等天亮了看清一切再说。

天亮了，得到消息的梁仞千带着县委的同志们匆匆赶来，向群众确认，这就是八路军的队伍，群众笑着端出了茶水，给同志们压惊。梁仞千代表县委连连道歉：前一阵子，这里曾受到国民党兵的骚扰，还有一股土匪在流窜……分局的同志也表示，咱们的队伍事先没有跟县委联络，出现这些误会在所难免。

不过，郓城县委的工作成果又一次给分局的同志留下深刻印象：一是当地群众对党的认知，在郓城民众心目中，中共抗日人员已经成为“咱们的人”；再一个是群众联防自卫组织行动的力量。富有群众工作经验的王再天说，如果是国民党军队碰到类似情形，就是有一个师的兵力也会四散逃跑了。也有同志开玩笑说，可算知道梁山传统的厉害了。

千里赴延安

送走郭洪涛他们之后，鲁西地区的七大代表也选了出来，梁仞千是四位代表之一。

同年3月，梁仞千一行起身前去延安参加“七大”。西去数千里，梁仞千身患肺病，脸色惨白，平时多走几步就要卧床，长途跋涉全靠步行，途中要经过敌占区，几十道封锁线，屡遇险情，梁仞千咬牙坚持下来。一路上不仅战斗频繁，而且生活十分艰苦。特别是到了冀西地区，恰逢秋雨连绵季节，每天不但要翻好几座山，走八九十里路，而且没有吃的，只能靠挖野菜充饥。偶尔弄到一点粮食，由于没有时间和工具加工，只能煮粮食粒整吞，根本不能消化。梁仞千克服身体不适，沉着冷静，带领同志们一次次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一路上虽极其艰难困苦，但没有一个掉队的。终于经过长达八个月的跋涉，跨越五个省，行程八千余里，于1940年11月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到达延安后，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七大”延期召开。梁仞千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被分配到中央研究院工作。长期积劳成疾，本身患有肺结核的梁仞千身体越来越弱，最终因患伤寒，多方医治无效，1941年9月与世长辞。

梁仞千去延安后，家里没有了顶梁柱，在八年的时间里，一家人跟着冀鲁豫边区二地委四处转移，大一点的孩子在二地委所办的抗日小学学习，其他人始终没有固定居所。直到1944年，时任中共冀鲁豫边区二地委书记的董君毅（段君毅）同志，终于设法找到了暂居在河南范县的梁仞千母亲和妻子，这时家人才知道梁仞千早已牺牲三年的消息。

1972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梁仞千烈士的遗骨从延安迁回了家乡，安葬在郓城革命烈士陵园里，家乡人民永远记得他的英名。

学生时代的梁仞千